

中国电影中的 知识人形象研究

(1979~2008)

程远征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电影中的 知识人形象研究

(1979~2008)

程远征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电影中的知识人形象研究：1979～2008 / 程远征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305-12202-6

I. ①中… II. ①程… III. ①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电影评论—中国—1979～2008 IV. ①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625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中国电影中的知识人形象研究(1979～2008)
著 者 程远征
责任编辑 束 悦 纪玉媛 编辑热线 025-83686308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2.5 字数 211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2202-6
定 价 2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关于“知识人”	1
一、舶来的“知识分子”概念	1
二、中国古代的“士”传统	5
三、何为“知识人”	7
第二节 对于中国电影中知识人形象的相关研究	9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12
第一章 集体性话语:典型历史语境下的知识人(1979~1987)	16
第一节 伤痕题材作品:对历史是控诉也是告别	19
一、作为“过渡者”的女性	20
二、等来的“光明”的结尾	24
第二节 历史断裂所带来的荒诞	28
一、《孩子王》:“无地彷徨”	29
二、《黑炮事件》:西方审美式的荒诞	32
第三节 “新启蒙”过程中的悖论	35
一、“工具理性”和“人道主义”	37
二、个人情感世界中的伦理冲突与矛盾——高加林之难	41
第二章 知识人成为中国现代性矛盾的集中体现对象(1988~2000)	45
第一节 家庭伦理的现代性迷失	48
一、现代与传统的冲突	48
二、历史的负荷	51
三、人性内部冲突的体现	54
第二节 经济社会下的尴尬地位	57



一、相对封闭的空间·····	57
二、知识人与暴发户·····	59
第三节 《顽主》:王朔电影中知识人形象的解构·····	62
第四节 现代性之个体的审美化生存·····	65
一、感性欲望和过去时态·····	66
二、个体经验的书写和自我身份的独特性指认·····	70
第三章 知识人地位的进一步边缘化(2001~2008)·····	74
第一节 两性关系中地位的变化·····	76
一、孩子成为讲述者·····	76
二、从“主角”变为“配角”·····	79
第二节 专业上的困境·····	83
一、匮乏与妥协·····	83
二、语言/意义的尴尬和消退·····	86
第三节 对于真理把握能力的丧失·····	90
第四节 不那么“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93
第四章 女性知识人形象的塑造·····	97
第一节 想象的能指:永恒的女性·····	101
第二节 反抗中的陷落:非理性的情绪型人物·····	105
一、“弗洛伊德”学说和成长故事·····	105
二、爱情理想的覆灭·····	111
三、对于身体政治的反抗·····	115
四、母女关系主题:女性知识人的自我省思·····	119
第三节 女性基本困境:“能指”与“所指”下的性别权力·····	122
第五章 知识人的身份认同方式之一:知识人与群众的关系·····	129
第一节 知识、真理与权力·····	131
一、“家国梦想”和“民族国家认同”·····	131
二、知识价值和道德标准并重·····	135
第二节 精英主义话语与时代焦虑的隐形表达·····	137
第三节 知识人群生相与现实主义风格·····	142



第四节 知识人的两性关系:知识人与群众关系的隐喻性文本	147
一、被毁灭的个体:启蒙是否可能?	148
二、“同是天涯沦落人”:非启蒙性的两性关系	150
三、被误读和被嘲讽的启蒙:并非合理两性关系	153
第六章 知识人的身份认同方式之二:知识人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156
第一节 知识人在现代化叙事中的矛盾心理:外在的西方世界	158
一、西方是启蒙的历史性诉求对象	159
二、西方是非情感性的存在	161
第二节 知识人自我认同的分裂:走进西方世界	164
一、身份的迷失	164
二、文化的冲突	168
第三节 知识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主义精神:征服西方世界 ..	171
一、来自“西方”的妥协	172
二、来自“本土”的胜利	175
结语 电影与知识人	178
参考影片	181
参考文献	184
后 记	191

绪 论

“知识人”这个名词也是借用“intellectual”的日译。现在收入本书，一切仍依汉文原稿，不作更改。但是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反而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适切。大约是一两年前，我曾读到一篇谈“分子”的文章，可惜已经忘了作者和出处。据作者的精到分析，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近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①

——余英时

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中才能加以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②

——许纪霖

第一节 关于“知识人”

一、舶来的“知识分子”概念

“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俄国，当时俄国跟西方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地发生各种军事冲突，在这过程中，俄国的一批贵族发现了自己在民族在制度、科技和文化方面的落后，于是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向西方学习。学习之后的贵族们对于自己国家和社会中的种种弊端怀有强烈的批判精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神,认为应该对现行秩序进行改造。但是,当时在俄国知识界也有一些人认为不能盲目地进行西化,还是要遵循自己的民族传统。于是,知识界关于俄国到底往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这些展开论战的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现象成为界定“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重要来源。另外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典型性事件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蔑犯有叛国罪,由此掀起了法国右翼分子反对犹太人的风潮。当时,法国的很多学者、作家还有艺术家纷纷站出来声援德雷福斯,比如左拉、雨果和纪德等人,这些人后来都在189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由于这些“知识分子”的介入,德雷福斯最终得到了赦免。“德雷福斯事件”开启了法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传统。因此,尽管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俄国“知识分子”和法国“知识分子”有道德观上的分歧,但是“知识分子”这个词语仍旧跟19世纪西方的人文话语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蕴含着强烈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还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思想渊源,直接通往启蒙运动后不断被探究和放大的个体内心。

不过,按照这样的解释,被“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所界定的人群要狭窄很多。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有僧侣、传教士和士大夫这样的角色很早便承担起传播文化的任务,但是他们跟近代的“知识分子”有诸多不同之处。在现代制度下面,“知识分子”普遍被学院化、专业化和官僚化,也逐渐丧失了面向主流社会的对抗性和批判性,这些人也不符合上文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而在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身份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往往只是为了方便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划分,“知识分子”始终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被运用。周宪教授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一书中曾按谱系学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三类:首先是“启蒙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典型的代表是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其次是“技术官僚型知识分子”,主要指各类公共机构科层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最后就是“批判型知识分子”,这类“批判型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现实时往往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并始终保持怀疑的眼光,对居于中心位置的价值观和权威传统发出挑战,反对不合理的文化霸权和现存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类型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知识分子”,也被大多数人视为“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①

① 参见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42-470页。



虽然“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概念主要来自于西方,但是在西方,对于“批判型知识分子”也并非全部是赞誉之声。“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这个世界发生作用,是知识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原因,西方的“知识”一直跟“现世和实务”没有什么关系,“intellectual”过的乃是“静观的人生”。^①这种对待知识的态度,在后来一些人那里也得到了传承,比如胡塞尔、朱利安·班达、马克斯·韦伯以及雷蒙·阿隆等。“胡塞尔认为,知识分子是以追求超验事物而与追求经验事物的芸芸众生相区别,并在意义和象征世界中,解决世界人生重大问题的人。”^②朱利安·班达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利用学说玩弄政治激情的话则是对自己角色的背叛,是哗众取宠和谋取个人利益的一种方式,“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勒努维耶),所以知识人应该是“静态的、大公无私的和理性的”^③。韦伯也提出,知识人要保持“头脑的清明”,“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韦伯“警告‘现代知识人’,不要在没有先知的黑夜时代去充当先知,尤其是不要充当穿上学术甲冑的先知”。^④阿隆则在《知识分子的鸦片》这本书中严厉地批驳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狂热状态。

但是,毫无疑问,在启蒙运动之后的几百年里,无论在大众还是在学术界人们的心目中,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已经逐渐被“独立性”、“批判性”和“介入性”等所替代,而“独立性”、“批判性”和“介入性”也跟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各种现代性后果密切相关:物质世界的丰富,科学态度的形成,人类自我的放大,等等。不过这种态度并非突如其来,在某种程度上,是基督教文化内在脉络演进的结果,因为在西方,基督教本身便有着很强的“救世感”和“参与感”,即带有一种教化众生和改变世界的愿望,而且,基督教本身末世教义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也与现代化概念中的线性历史观息息相关。

在近代,关于“批判型知识分子”更为广泛的讨论是关于“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逃离消费社会、媒体社会和官僚科层制度的控制和诱惑,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曼海姆曾提出“知识分子”必须是“自由漂浮的、非依附性的”,这样才能疏离于各个利益阶层之外。葛兰西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

①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 页。

② 王岳川:《后现代知识转型与知识分子危机》,出自《学术月刊》,1994 年第 2 期。

③ 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3 页。

④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33 页。



下,意识形态霸权往往通过“知识分子”对于各种制度形式的控制来完成,这类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集团所服务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因此,工人阶级要想团结起来获取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创造出相关的“意识形态”,用以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古纳德却认为具有专门化知识的“新阶级”的出现是对于作为财富拥有者的“旧阶级”的颠覆,而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可以使得他们的话语方式带有一种方向的多样性、主体的自愿性和对于现实的批判色彩。但是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中,古纳德所定义的“新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很难脱离“技术官僚型知识分子”的命运,而“知识分子”要想保持独立性,就必须坚持自己的“业余者”立场,“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①。只有像这样,“知识分子”扮演的才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②不过,在福柯眼中,这种万能型的“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渐趋消亡了,因此,反叛和颠覆只能在专业型的“知识分子”那里完成。在无所不在的现代权力体制之中,从微小之处进行抗争是推动话语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的历史可能。布尔迪厄则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在自己专业的自律和自主的基础上对政治进行干预,即通过对“知识场域”的参与行为来进入政治领域,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到侵害。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分子”们首先会对“知识场域”中的权力进行争夺,“知识场域首先是争夺谁拥有界定什么是文化生产的合法形式的权力的场所。布尔迪厄关注知识场域内部的各种位置而不是知识分子个体或特定职业群体”^③。德布雷认为当代社会“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体结盟的现象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追逐自己的名声,为政府的意识形态、资本的利益控制和媒体所带来的虚妄个体光环所累,最终自由思考的权利被剥夺。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67 页。

② 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3 页。

③ 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6-257 页。



总之,近代西方思想界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跟现代性内部的各类冲突有着密切的呼应关系。随着全球化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在逐渐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而对于整个 20 世纪中国境遇的讨论,也都无法脱离世界整体格局的大场域,所以,这些相关的观点对于中国“知识人”状态的探讨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中国古代的“士”传统

春秋之前,“士”是一种官职的名称。《尚书》中第一次出现的“士”是“主管镇压外族扰乱和内部盗贼的‘司法部长’、‘警察总监’一类的官职”^①。当时,只有少部分的“士”从事占卜和穷通鬼神的工作,即“知天道”。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坏乐崩”,“士”开始进入到“庶民”的行列,同时“士”这个阶层也开始跟“道”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并且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论语·泰伯》的《里仁》篇中提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尽心上》中也有“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矣”之句。荀子也一再强调“从道不从君”的独立性原则。西汉的刘向在《说苑》中给“士”下的定义是:“辨然(否)、通古今之变,谓之士。”^②可见在儒家文化中,思想上是否具有对于“道”的信念和行动上是否可以对“道”身体力行已经成为衡量“士”的重要原则。

而跟肯定现世人生的“儒家”相比,同样提倡“道”的道家则强调“自然”之宗,认为应该忘掉一切文化所造成的差别,塑造绝对自由的“逍遥游”的理想人格,并认为这样才能与“道”完全合而为一。不过,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其中所提到的“道”并非像过去那样单指“天道”,还指“人道”。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③即人先了解自己,然后才能了解“天道”。跟世界上其他几大文明的“超世间”取向不同,中国文化传统讲求“天人合一”,这样的“天人合一”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的“士”带有一种“内向的超越”^④特色,即注重“修身”,通过“修身”来靠近“道”,也通过“修身”来证明“道”的合理性。

① 贾春增:《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变革》,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 页。

② 以上引用皆出自余英时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28 页,第 89 页。

③ 孟子:《孟子·尽心上》,选自孟子:《孟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9 页。

④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07 页。



《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墨子·贵义》：“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慍。”《老子》：“修之于身，其德乃真。”^①因此，“道”同时成为中国古代知识人追求的目标，只是侧重点不同，有的偏重于“天”（道家），有的偏重于“人”（儒家）。“儒家是主流中的主流，对世间最为肯定，但是同时也强调世间的一切价值来自超世间……道家比较偏重于超世间，然而仍然不舍离世间。”^②庄子云：“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③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的精神特质。也因为此，中国文化与外来的佛学义理之间的融合显得比较容易，而等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儒学跟中国的禅宗紧密结合，这种“内向的超越”也变得更加明显。

春秋时期，由于封建秩序的解体，礼坏乐崩，“士”的身份从“贵族”变为“庶民”，身份的转变得使得“士”进入了一个在思想和行动上相对自由的时期，并且承担起传播诗书礼乐的文化重任，成就了当时“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兴盛局面。但是中国的“士”始终很难成为一个“彻底独立”的阶级，中国文化中的融合性、变化性和入世性，使得“士”身上很难表现出现代“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诸多特性，也很难摆脱对权力阶层的依附命运。“士”之独立性的保持更多只是依靠自身对于“内向的超越”的追求，即“士”依靠不断地“修身”来确保“道”的尊崇地位。到了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理念开始盛行，儒家中的“士”名正言顺地占据了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位置，但是不免增强了对权力阶层的妥协。不过，在汉代，“士”是否能够进入仕途还要看乡曲的清议，也就是说，汉代的“士”仍旧要注重自我的品节修炼和社会评价。等到了隋唐，科举制度开始出现，这使得“士”不再那么需要群众基础，而是功利性地一味揣摩朝廷的好恶。很多的“士”名正言顺地成为权力阶层的依附者，而丢掉了确定自己身份最基础的社会土壤。等到清末，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士”的传统产生了断裂，中国也开始出现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型的人，并且在民国时期，形成了一个高潮。跟春秋时期一样，这种“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出现，跟在动乱时期他们与权力关系的割裂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这类

① 以上引用皆出自余英时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14 页。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06 - 607 页。

③ 庄子：《庄子·天下》，选自庄子：《庄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85 页。



“批判型知识分子”往往在后来都会面临着类似的“批判型”的命运，比如，丧失了权力阶层的庇佑，自身的权威和地位应该如何确立；如何避免成为派系之间的斗争砝码和再度被权力阶层收编，等等。而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他们有时甚至要通过自我更新和自我反动来实现。

三、何为“知识人”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在第 1467 页中对于“知识分子”下的定义是这样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 1990 年出版的《社会学百科辞典》中的“知识分子”定义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以依靠脑力劳动获取报酬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阶层。如科学技术工作者、医生、教师、记者、文艺工作者等。”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并且被分散到各个不同职业的工作岗位上，这种划分方式已经不再专属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知识分子”也不再只存在于“体制之内”。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很多“知识分子”不愿经受体制的束缚，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思考和创作，而越发专业化的划分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热情和活力得不到充分的释放；另一方面则在于，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出现，很多“知识分子”想利用自己的知识创造出较多的个人财富，经济上的诱惑也使得“知识分子”不甘于停留在“象牙塔内”的生存状态。不过，很多想要保持“独立性”的“知识分子”摆脱了体制，但是又难免陷入“市场”的泥沼。当自己的作品被市场经济的消费趋势所左右时，保持“独立性”再度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

近些年来，“公共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界讨论得非常热烈的一个概念，甚至很多人开始重新考究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定义。一部分学者根据西方学界对于“知识分子”的争论，认为在市场化、专业化和学院化的环境下能够对公共事务保持独立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才算真正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诞生至今，“公共知识分子”整体处在衰微的阶段，这种衰微不仅发生在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冷战结束，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得到了普遍性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则在这种生存发展模式下被削弱，而其“独立性”被冲击，究其根本，是原来明晰的意识形态被冲击的结果。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知识界发起的人文精神的大讨



论,凸显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企图重建自己身份公共性的努力,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分歧。“知识分子”内部对这种重建的可能性也出现了质疑和分歧,即重建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话语是否只是西方现代性影子下面的另一种宏大叙事,而这种宏大叙事在现代性的重重困境中是否应该被警惕,以及是否真正具有未来性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于是,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下,重建公共性的声音最后竟变得逐渐微弱。在近些年所展开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各种讨论中,“知识分子”的定义似乎并没有清晰化,而是变得越来越模糊。

许纪霖教授说:“回过头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①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点出了“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真相。余英时先生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感觉用“知识分子”来形容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人不甚合适,因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舶来者身份和中国迥异于西方的历史语境。所以,近些年来,余英时先生在著作中一律改用“知识人”的称呼。本书把研究对象确定为“知识人”,即借助余英时先生文中所提的“知识人”一词,一方面,希望能够减弱“知识分子”定义中过强的功能性,而且避免这个概念在近些年来所引发的种种异议,同时延续余英时先生所说的“想尽量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②;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本书中,对于新时期中国电影中“知识人”之“人性”塑造过程中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而其中对于“知识人”形象的塑造,往往是一个对其“功能性”和“人性”两个方面加以重新安排的过程。在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中,“知识人”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多方权力制约平衡的结果,而对知识人“人性”部分的表现,似乎越来越多。因此,本书研究对象的具体划分方法除了以职业特征为标准,即《社会学百科全书》里面提到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医生、教师、记者和文艺工作者”,也包括“等等”中的那些具有典型知识人身份和气质的人物。另外,在引文过程中,为了保证本书的规范和对原有作者的尊重,依然沿用原有文章的提法,即原文如是“知识分子”,仍按“知识分子”引述。

中国电影的一百余年的历史,几乎与中华民族历史上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相重叠。中国的知识人在百余年来经历了太多的沉浮,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

①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② 余英时:序,《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期中,知识人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不断被推到时代的浪尖,也陷入到一波又一波的尴尬境遇里面。在对于阶级属性大加强调的年代,知识人本身因其独立思辨性较强,所以往往会跳出固定的思维模式去思考问题,“阶级立场”便显得不那么坚定;同时,因为知识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其本身的阶级属性的变动性也很大,而知识人在阶级划分上的游离状态反过来也使得他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无足轻重。卡尔·曼海姆曾经对于这种阶级划分方式进行批判:“知识阶层是一个处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空隙中的阶层,以阶级和政党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社会学只能将这种非阶级的聚合体视为某个既存阶级或政党的附属物。这种观念自然掩盖了知识分子的特殊动机,并且有可能使其自我评价失效。”^①中国知识人在20世纪两度遭到西方文化的洗礼,这是他们遭遇到的最深层的文化挑战,无论是成为西方的“影子”还是西方眼中的“他者”,都使得他们备感困扰。中国知识人与西方“知识分子”的身份意义有着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的诸多差别;同时,他们与传统的“士”相比较,又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而“知识人”这一阶层的尴尬处境在中国电影里的各类亮相可以被看作是对其实社会地位的折射:时而被同情,时而被重视,时而被批判,甚至成为一个似乎谁都可以对其指指点点的角色,或者干脆身份一点点模糊掉以至于不被表现。当然,知识人这种尴尬处境,也不全部专属于中国“知识人”,有些困境是属于当代全世界所有“intellectual”的,其背后影射的是在迈入现代化过程中许多非西方国家人民的集体精神失落,以及西方国家在不断推进它的价值体系和经济模式时,所遭遇的各种问题。

第二节 对于中国电影中知识人形象的相关研究

对于知识人形象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界并不少见,大部分都集中在对于文学作品中知识人形象的研究上面,对电影里知识人形象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文学作品中知识人形象的研究有几个典型性的方向,比如,按照历史阶段性的划分来研究不同时期知识人形象的变迁,这种研究往往与时代政治背景关系密切;从中国传统“士”的发展历史和文艺学的角度来对文学作品中的知识人形象类型进行归纳总结;对于特定时期文学作品中知识人生平和学术成就的

① 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论述,像 20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和 80 年代都是常见的研究范围;对于一些著名文学流派作品中或者著名作家作品中的知识人形象研究;还有从社会学和哲学角度来研究作品中知识人形象变迁的,等等。这些研究跟对于中国电影中知识人形象的研究在方向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按照研究的成果来说,前者远远大于后者。

在陈墨教授发表于《电影新作》2006 年第 3 期的文章《新中国电影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1949~1976)里,作者对这段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影片进行了梳理,并且对其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出现进行了政治和社会原因的分析。在文章的开头,陈墨框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义,那便是“所有有知识的人”。接下来,以影片《桥》和《光芒万丈》为例,总结了“新中国电影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共识”,即“作为工人阶级的陪衬,处于银幕边缘,一片苍白灰暗”,而《民主青年进行曲》、《思想问题》和《走向新中国》等影片则表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影片受欢迎的原因是它是解决知识分子思想问题的好教材。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则因为小资产阶级感情充沛,遭受到了严重的批评。而随着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批判运动的展开,“影片中的工程师或教授形象,无一例外被刻画为行为保守、思想落后,需要经过教育和帮助才能够认清形势,跟上历史前进步伐的人”。后来虽然在“百花齐放”的形势下,出现了几部正面描写知识分子形象的电影,但是知识分子依然是“心性孤傲、脾气古怪、动不动就要甩手不干”,再有就是“研究方案和具体方法仍然是保守的”。在 1959 年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和大跃进失败后的 1961 年、1962 年,对于知识分子的批评趋势开始有所减缓,因此,产生了像《早春二月》那样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电影。

饶朔光教授发表于《当代电影》1999 年第 6 期的论文《论新时期后 10 年电影思潮的演进》之第一部分“‘王朔电影’市民话语·大众文化”中,以王朔电影为切入点,论述了在大众文化不断高扬的过程中,市民话语及其价值观念对中国 80 年代启蒙文化的精英话语的冲击,及其里面的“反知识分子”文化情绪对以后中国电影中知识人形象的塑造形成的巨大影响。而面对这样的情况,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精英也往往采取“肯定其现实合理性、合法性,突出其正面价值,削弱其负面价值并规范其发展”的认同态度。同时饶朔光教授也比较了王朔作品在被不同电影导演改编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风格,比如米家山的《顽主》最忠实原著的“反讽风格”,而黄建新的《轮回》仍“以启蒙者的姿态在向社会、观众作着演讲”,在夏钢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大撒把》之中,“弥



漫于影片中且喜且悲的都市情怀让我们陶醉和感动,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没有‘失落’,而只是变奏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世俗化的姿态和表述”。然而,这些变化“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时代的原因,毕竟文化时尚的形成不以知识分子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向大众(审美时尚及其价值标准)的‘投降’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陈吉德发表于《南京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上的文章《论中国电影表现知识分子的三次浪潮》里面,提出了中国电影史上大规模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出现的三次浪潮,即40年代后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第一次浪潮出现的知识分子被分为三类,即“刚正不阿的正义者”、“随波逐流者”和“为情所困者”。第二次出现的知识分子被分为“政治所困者”、“为日常生活所困者”和“为传统文化所困者”。第三次浪潮出现的知识分子被分为“为家庭所困者”和“茫然求索者”。作者总结道,第一次浪潮对知识分子的表现过于注重民族、阶级和时代等“宏大视角”,第二次浪潮过于把知识分子当作政治反思的符号,第三次浪潮把知识分子描绘得过于猥琐卑微,原因是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的银幕定位问题,没有把知识分子当作实在的有血有肉的人来看。

史可扬教授在发表于《唐都学刊》2005年第3期的文章《论中国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中,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百年电影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把知识分子分为人生道路的追索者、民族传统美德的承载者、传统文化人格的体现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作者提出中国电影在人物表现上“缺乏对心灵的细腻触摸和对个体命运的深情抚慰”,而知识分子的形象也是如此“孤寂、尴尬和落寞”。

张颐武教授在发表于《电影艺术》1997年第2期的文章《共同社群的认同——90年代电影中的知识分子》中,以“社会学”中的“社群”概念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里的知识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知识人在社群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来作为衡量标准,首先总结出知识人/社群之间的关系在电影叙事中的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由社群的认同出发,表现知识分子在社群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表现知识分子的凝聚社群的共识,为民族发展所付出的贡献”,如影片《烛光里的微笑》、《蒋筑英》和《凤凰琴》等。“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电影表现则更为复杂,它乃是提供了一种个体/社群之间的辩证的互动关系,将知识分子在其中的认同的复杂性进行了深入的表现”,如影片《大撒把》、《无人喝彩》和《混在北京》等。而在90年代中国电影中知识人/社群关系的两种不同形态“投射了这个时代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文章的结尾,张颐武